

女主：古中国政治中的性别博弈

——唐书中“东女国”的女性政治问题探析

和丽春，李勤莲

(1.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2. 云南艺术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摘 要：在国史上，女性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女人当国历来受到各种不公的批评。而本文则基于性别政治和女性主义政治观，对唐书中“东女国”的女主问题进行考察，论述国史上的女主和东女国女人当国的政治问题，并从古中国政治中的性别博弈的史实来说明女性不应该被边缘化，也不应该轻视她们对历史的影响；历史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复杂多面体，不能忽视其它貌似次要的因素。史实表明，只要条件具备女性也可以承担男性所承担的政治责任。未来的政治应当寻求两性的和解，终结性别政治。

关键词：女主；东女国；女性主义；性别政治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13)03-0042-04

作者简介：和丽春，女，云南丽江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和政治学研究。李勤莲，女，云南艺术学院机关总支书记。

女人摄政，甚至是当国，其政治合法性源自何处？这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性别政治学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文化学的难题。尤其是在所谓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男人的历史里，女性基本上缺席、不在场，没有声音，少有文字。两性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所遗留的痕迹都严重失衡。男性雄踞文明史的中心，代表着逻各斯、理性、话语的生产者和掌控者、社会前进的指挥者和设计师，而女性却屈居边缘，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感性、非理性、懦弱、无知等负面语词无形之中竟然和女性划上了等号；一切历史不仅仅是当代史、思想史，更是男性史。在这样的世界历史背景之下，毫无疑问女性已经先天地输给了男性；在性别政治的博弈之中，女性输多赢少，即便是偶尔小胜一场，其政治合法性也严重缺乏牢固的根基。

而女性主义的出现，则使得性别政治的二元对立，两性之间的张力有所缓和；使得古中国政治中的女主们不再苦遭非议。并进一步对男权发起攻击，为女性的合法权利进行有力的辩护，使得女主具有更强的政治合法性。同时，这也为未来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道路，即寻求两性的和解，使得性别政治中的二元对立论消解，实现性别之间的平等，既能理性地看待性别差异，又能合理地进行性别优势互补与合作，促进人类政治的良性发展。

一、国史上性别政治博弈中的女主

人类文明史所呈现的性别，已经不再只是生物学上的两性关系，还是一种权力关系，即一种特殊的支配关系：男性支配女性。在男权社会与

父权中心的时代，两性在政治上的博弈，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我国古代，又因为有诸如：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贤妻良母、女子无才便是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系列的扬男抑女观念构成了一个牢固的文化传统，使得女性的正当权益更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翻遍几千年的华夏民族史志，我们很少能寻到女性的踪迹，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能够在男权时代里执掌国之利器的女性稀如鳞毛凤角。在一场场的性别政治博弈中，女性惨遭失败，胜者屈指可数。

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某些外国“女权主义”式的观察，也许是历史的巧合，西方强国作为政治的他者大量进入我国时，正值慈禧太后摄政。以至于他者误认为我们国家的女性充分享有平等的权利，对我国的情况所作的判断也有失公允。19世纪中叶，一位驻中的英国翻译官迈多士先生，就曾对中国妇女的地位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中国妇女仍较盎格鲁-撒克逊人更为男子的奴隶，但由于儒家孝顺父母的原则，缓和了这种奴隶性质。政府即使明知真正的理由在逃避一些公务上的困难，也不敢拒绝身为独子的官员，以照顾年迈寡居的母亲为由告假；另一方面，一个政府官员，却不敢因照顾病痛中的妻子，或拜访由于公务而长久分离的亲朋好友而告假。外国官员对配偶的关心，多少影响公务责任的情形，令中国官员们觉得比什么都更惊奇和有趣。中国人极少将极熟悉的朋友介绍给自己的妻子，这并不是一个恭维的举动；而介绍给母亲却很常见。被介绍的人要

收稿日期：2013-02-15

• 42 •

向这位妇人叩头, 也就是说跪在她的面前, 并重复地以前额碰地。做儿子的并不阻止, 只是以下跪和叩头向他的朋友答礼。就这样, 在中国常可见到两个居高位, 有着灰白头子的男人, 为尊敬一个和自己同一阶层的女子而叩头。一个做母亲的在县官面前控告自己的儿子时, 不必细究其子何以冒犯长上, 就会受到黑奴在美国鞭笞室中相似的责罚。读者或会得到这样的结论: 认为在中国这种社会和法律上的母权, 会普遍地提高妇女的地位; 事实上也是如此, 虽然她们在自身婚姻上, 都只是被动的工具而已。[1] (P60-61) 其描述和评论隐含着矛盾, 一方面古中国女性的地位的确不高, 但是若说女性是男性的奴隶, 这恐怕难以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论断。女性虽然地位低下, 但是由于儒家仁孝文化的影响, 作为长辈的母亲却享有异常高的地位, 若是父亲去世, 则母亲成了一家之主。在法律上, 母告子具有天然的优先性, 容易取得胜诉, 但这并不能说明母权的优先性; 事实上, 这只不过是父权优先的体现, 更是一种文化的内在逻辑, 即孝道先于法制, 德行高于制度。古中国的女性既没有启蒙之后西方女性那样的法律地位, 但也没有沦为奴隶, 而是处于文化、道德和政治的多重束缚之下, 既在枷锁之中, 但也享有一定的权利和自由。

在这个以男性为主导, 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家长制社会里, 迈多士对古中国的母权地位过于

拔高。当然, 在国史上, 母权虽然远不及父权那样具有影响力和穿透力, 但往历史的边缘瞭望, 就会发现母权在历史中的作用, 女人对政治也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有几个短暂的时期, 在政治博弈中, 女人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她们掌控着国家权柄, 进行统治。不管是汉族, 还是少数民族都曾有过太后摄政, 可以“将母权和太后摄政, 或中国的女主制度相提并论。” [1] (P64) 尤其是汉、北魏 (鲜卑)、辽 (契丹)、宋、元、清的太后们, 不少人都非常有权势。唐朝的女皇武则天, 还建立了自己的朝代, 她于公元 690 年, 废睿宗, 正式称帝, 自号“圣神皇帝”^①, 改国号为周。[2] (本纪第六) 她们曾经在国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可信的记载如, 前汉吕后摄政, 汉高祖十二年 (前 195 年), 刘邦驾崩。17 岁的太子刘盈即帝位, 吕雉为太后。刘盈因年幼且仁弱, 故而大权操控在吕太后手中。其摄政时期是从公元前 188 到公元前 180 年。[3] (吕太后本纪) 后汉邓后 (摄政时期: 105-121 年), 北魏冯后 (摄政时期: 465-471 年、476-490 年, 逝于 490 年), 还有对武曌和慈禧太后的记载及研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我国古代历史上主政的女性多达三十来位, 简要情况见下表。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女主情况统计表:^②

朝代	主 政 者	与其前皇帝关系	名、号	主政时间
西汉	吕后 (? - 前 180)	汉高祖之后	稚	前 188 - 180 年临朝称制
东汉	窦太后 (? - 97)	汉章帝皇后	不详	公元 88 - 92 年临朝称制
东汉	邓太后 (80 - 121 年)	汉和帝皇后	绥	公元 105 - 121 年临朝称制
东汉	阎太后 (- 126 年)	汉安帝皇后	姬	公元 125 年临朝称制
东汉	梁太后 (116 - 150 年)	汉顺帝皇后	姁	公元 144 - 150 年临朝称制
东汉	窦太后 (- 172)	汉桓帝皇后	妙	公元 167 - 168 年临朝称制
东汉	何太后 (- 189)	汉灵帝皇后	不详	公元 189 年临朝称制
北魏	冯太后 (441 - 490)	文成抵皇后	不详	465 - 467、471 - 480 年两度摄政
北魏	胡太后 (- 528)	孝明帝母	不详	515 - 528 年间两次临朝称制
唐	武则天 (624 - 705)	则天大圣皇后	曌	大周皇帝, 690 - 705 年在位
北宋	刘太后 (968 - 1033)	真宗皇后	娥	1022 - 1033 年临朝称制
北宋	高太后	英宗皇后	不详	1085 - 1093 年临朝称制
南宋	谢太后 (1210 - 1283)	理宗皇后	道清	1274 - 1276 年临朝称制
辽	述律太后 (879 - 953)	耶律阿保机之后	平	926 - 947 年称制
辽	萧太后 (承天后 953 - 1009)	景宗皇后	绰	983 - 1009 年称制
辽	萧太后 (法天后)	兴宗之母	彝斤	1031 - 1034 年称制
北辽	萧德妃	宣宗耶律淳皇后	不详	1122 年尊为太后并称制
西辽	感天皇后	德宗耶律大石之后	塔不烟	1143 - 1150 年称制改元“咸清”
西辽	承天太后 (- 1178)	仁宗夷列之妹	普速完	1163 年称制改元“崇福”
西夏	梁太后 (前)	毅宗谅祚之后	不详	1086 - 1076 年临朝摄政
西夏	梁太后 (后)	惠宗李秉常之后	不详	1086 - 1099 年摄政

① 参阅《旧唐书》本纪第六和《新唐书》本纪第四。本文涉及唐代史料的, 同时参考了《新、旧唐书》。

② 该表系笔者根据二十四史史料汇编而成; 以便读者对国史上的女主情况有一个比较直观而全面的了解。

朝代	主政者	与其前皇帝关系	名、号	主政时间
蒙古	乃马真后(-1265)	窝阔台汗之妃	脱烈哥那	1241 - 1246 年摄政
蒙古	海迷失后	贵由汗之妃	斡兀立海迷失	1248 - 1251 年垂帘听政
蒙古	倭耳干纳女汗	哈刺旭烈兀之妻	不详	1251 - 1260 年主政察合台汗国
元	卜答失里后(-1340)	元文宗皇后	弘吉剌氏	1329 - 1340 年称制
清	慈安太后(1837 - 1881)	咸丰皇帝之后	钮祜禄氏	1861 - 1872 年两宫摄政 1874 年两宫再次临朝
清	慈禧太后(1835 - 1908)	咸丰帝之妃	叶赫那拉氏	同治光绪两朝实际最高统治者
清	隆裕太后(1868 - 1913)	光绪帝之后	叶赫那拉氏	1909 年光绪慈禧死后垂帘听政

这些国史上的女主们能够实现摄政或者称帝的梦想，大部分都在其前的皇帝任期内就已经贵为皇后或者妃子，政治地位非常高，其外戚也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又由于皇位的最终继承人都比较年幼，或者能力不如其父，再加上外戚的专权，或者是内外交困，这使得她们执政成为可能，并且还能借助种种外界不确定的因素，与辅政大臣勾结，就能进行皇位候选人的重新洗牌，以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

女人（主要是太后）摄政的制度化开始于东汉。早在2世纪时，蔡邕就在其《独断》中对太后摄政仪式有过记载：“后摄政，则后临前殿朝群臣，后东面，少帝西面，群臣奉事上书，皆为两通，一旨太后，一旨少帝”[4]（P3）不过文中没有垂帘听政之类的记录，直到武后才有这样的改革。[2]（高宗本纪）到了宋朝，也有几位太后摄政。如，刘太后她偕同幼帝仁宗到承明殿进行帘后主持决策。高太后效仿刘太后，常和哲宗来到迎阳门：同坐于帘后。

到了清王朝（主要是从光绪朝起），对太后摄政的规定有了一套细致而成熟的方案。这主要集中在《大清会典》里，对太后摄政有了比较多的制度保障。当然不是所有的太后都可以享受这样的政治厚遇：能够掌控国之权柄。只有具备相当的条件才可以。“所谓相当之条件者，亦无成文法为之明白规定；稽诸史策所载，约有下列三者：（1）皇帝年幼。如，东汉窦太后临朝，和帝年仅十岁；邓太后临朝，殇帝方诞育百余日；梁太后临朝，冲帝年仅二岁。（2）帝疾不能视事。如宋英宗感疾，请曹太后权同处分军国大事；神宗侵疾，宰相王圭奏请皇太后权同听政。（3）先帝卒崩，或有遗诏。如，汉安帝崩，阎皇太后先临朝，后策立少帝。唐高宗崩，遗诏军国大事，听天后处分。毫无疑问，太后摄政的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性参与政治得以可能。从而使得其拥有了与男性进行政治博弈的人场券。女人当国，从此也具有了一定的法理依据，加之女主与皇上的婚姻关系和继位者的血亲关系，使得她们的政治合法性又多了一重天然的亲缘性保证，若其个人还能具有超凡的才华和人格魅力，那就成了韦伯所说的“奇理斯玛”式的领袖。这样，女性的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而这种世袭性的政治合法性，在东女国的政治活动中尤为突出，使得女子当国成为一种常态。

二、作为国史上女性政治典范的东女国

出人意料的是，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也曾出现过女人当家，女人当国的事情；而这样的情况，却被当地人们所认可和接受，成为一种女主的典范。这可谓是有文字记载的女性地位明显高于男性的民族。当然这些记载至今，真伪比较难辩，然而结合多方史料和考古发现，有一点是毫无争议的：该地区在古代社会，曾经出现过女子当国的政治现象。

唐书所载林邑国有过女人当国的史实“十九年，镇龙为其臣摩诃漫多伽独所杀，其宗族并诛夷，范氏遂绝。国人乃立头黎之女婿婆罗门为王。后大臣及国人感思旧主。乃废婆罗门而立头黎之嫡女为王。”

[2]（P5270）这表明了女人当政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血亲关系。因此，女人当国也是完全合法的。在东女国中，不论是从血缘上，还是法理上，女人当国都是合情合理的。在该国里，女性的地位整体高于男性。在隋唐以前，西部就已经存在一个女人统治的国家，风俗恰好与中原王朝相反，该地女重男轻；官僚系统之中宦宦多为女性，也与中原政治相悖。据《旧唐书》第一百九十七卷《南蛮西南蛮传》记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四万余众，胜兵万余人，散在山谷间。女王号为‘宾就’。有女官，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其王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政。女王若死，国中多敛金钱，动至数万，更于王族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为王，其次为小王。若大王死，即小王嗣立，或姑死而妇继，无有篡夺。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其王服青毛线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为小鬟髻，饰之以金。耳垂榼，足履索屨。俗重妇人而轻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为正。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赍楮诣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而有鸟如鸡，飞入巫者之怀，因剖腹而视之，每有一谷，来岁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灾异。其俗信之，名为鸟卜。其居丧，服饰不改，为父母则三年不栉沐。贵人死者，或剥其皮而藏之，内骨于瓶中，糅以金屑而埋之。国王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2]（P5277 - 5278）女人当家当国是习俗，具有正当性，女王有年号“女王号为‘宾就’”，处理军国大事，而且无须垂帘，国家高层官员也是女性居多。女王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与汉族历代皇帝所享受的等级没有什么区别：衣着华丽、住宅豪华、生活奢侈、侍从数百，而且厚葬。女王死后，其王位继承者仍为女子，“女王若死，国中多敛金钱，动至数万，更于王族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为王，其次为小王。若大王死，即小王嗣立，或姑死而妇继，无有篡夺。”在王族中找出两位美好的女子立为国王，年岁大的当大国王，年岁小的做小国王。大国王死了，小国王就登上大国王的位置，或者婆婆死了儿媳妇继承。这种王位继承制度与中原王朝的“兄死弟继”相似。国家机构之中许多官员都是由女性担任，“有女官，曰‘高霸’。而男性所任职位往往较女性低劣，且在外地履职较多。

这可以说是人类文明时代女性主义得到充分彰显的民族。女性不仅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合法的权益，而

且还掌控着国家权力和话语,女性是主导,决定着政治的未来和人们的福祉。这刚好像是中原王朝政治模式的倒立版,两者相比:一个以父权为中心,另一个则以母权为中心;一个是男性主导社会的发展方向,另一个是女性主导社会的发展方向;在政治博弈中,一个是男性取胜,另一个则是女性获胜。女性在东女国,犹如教徒升往天国。其权益得到空前的维护。

然而到了八世纪末,东女国的国王改由男子担当“以男子为王。”[2](P5278)女主的历史从此湮没在西南边疆的丛林之中。成为神话封存在历史的边缘上。虽然《旧唐书》对东女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但是到了唐代以后,史书关于东女国的记载就几乎中断了。为何东女国是女人当国?是什么原因导致女人在该国失势?东女国的由来是什么?其演变情况如何?等诸多问题,由于缺少相应的历史记载和考古证据,我们很难对其作出一个全面而真实的描述,这就使得东女国成了一个难解的文化之“谜”。

三、两性的和解:性别政治的未来

遗憾的是,在男权时代里,对女主的记载和研究都非常少,这是东女国成为历史之谜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女主们还遭受着各种非议,往往是带有强烈的价值批评和道德谴责,所谓“牝鸡司晨”之类的批判不绝于丹青。

国史上的女主政治与我们正史中的主流历史状况不一致,而且将其贬为异端。这就使得女人摄政障碍重重,成为异类,女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边缘化,也很少被学者重视!她们对历史和人类的影响也不断被忽视!短暂而神奇的东女国却给了我们另一种视角,另一面镜子,看到了另一种史实:女性在历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某些特定的时期,起着关键的作用,掌控着国之命脉。而之所以不为人所知,主要在于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书写是女性的书写,声音是男性的声音,从而遮蔽了女性的本真面目。

从以上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有好几位杰出的女性或隐或显地成为国家最高领袖,掌控着国家的最高权力,统治着全国,成为国之女主。但是,对女人干政历来批评不断,早在东汉就有了。公元107年,大臣杜根和同僚批评邓太后摄政,并请其将政权归还皇帝。史学家范曄也强烈反对太后摄政,尤其是太后们企图以自己的亲戚来掌控政府。不少皇上也反对女人干政,汉武帝驾崩时,遗诏少帝母陪葬;所谓子少母壮,淫乱后宫,外亲国戚专权,国之祸也。魏文帝也下诏禁止太后摄政和其家族干涉政治。南朝建立者武帝也如此禁令。明朝尤为突出“明太祖为了使皇后们能经常记住太后摄政的禁令,令工部制红牌,记载禁止太后干政的命令,并置于起居处所,这些红牌是以铁制的,漆成红色,饰以金字。”[5](P50-51)这种严格的禁令,使得明王朝没有出现女主现象,女人在政治博弈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反之,由此也可以管窥一个时代女性的命运和帝国的心胸、开放性、自由度与政治活力。越是专制集权的时代,父权就愈加强大,对社会和女性的控制也就越苛刻严格,女性的生存状况也就愈加糟糕。男子气概的线性时间就疯狂地膨胀。

于是时间便是有计划的、有目的的、并且呈线性地按预期展开;人生也就是在这种功利理性的驱使下,朝着欲望的实现和满足出发、前进和靠近。而女性所表征的那种永恒循环的时间却得不到应有的展现。人类思想继续在二元论的模式中不断碰壁,过于

注重男性、理性、名利、自我等等这一极,陷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泥潭里,而无法自拔。

人类若要有所突破,克服现今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其中的路径之一,便是改变对异性的看法,即改变男权中心观,超越性别二元论。

因为女性是另一极的象征,两性只有合为一体,才能相互成就对方。阴阳相济相生,作为阴性符号象征的女性,能“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尺度,本质上维护着文明史所共知的多种时间之中的重复和永恒”。[6](P351)女性象征着永恒,生生之谓易,生生则不息。在中国易经文化里,作为“乾卦”与“坤卦”象征符号的两性,男性与女性都各自与自然相融贯。而被省略的女性象征着阴柔、循环与永恒,与大地契合。一如美国哲学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所说:“大地和子宫都依循宇宙的节奏。大地上孕育万物的河流随月的盈亏而涨落,而女人子宫的来潮也经历同样周期性的变化。”[7](第六期)这样一种同一性,具有不可言说的神秘性。女性的生理周期竟然和大自然的变化遵循着类似的节律:月亏月盈、潮起潮落、花开花谢等周而复始的自然活动与人类依循着同样的道;人类也是不断昼行夜伏、少强老弱、福祸相依、悲喜交加、老而死,死而生,生生不灭。父权的坚毅、刚强、不断进取,勇往直前是难以接受这种循环与柔弱。“欧洲世界观的父权主义核心是一种文化恐惧,即害怕自然和女人的创生能力如果不受文化父亲们的管辖,将会是混乱无序的、席卷一切的。”[7](第六期)像大地一样具有无限创生力的女性,若没有管制、规训和惩罚,便能生发出无限,犹如老子之“道”:生一、生二、生万物。其实这也是老子的高明之处,他道破玄机,把永恒给赋予女性。

对女性时间的重视与回归并不意味着对男性时间的彻底否定。而是一种相互肯定,犹如天平的两端,失去任何一端,都将是一种毁灭。新女性主义运动便是在尊重两性差异的基础之上,寻求女性时间与男性时间的相互认同,以求达到两性的和谐共处。在政治活动中也是如此,女性并不比男性差,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男人应该统治,女人应该治理。提倡女性应该掌握实权,去做具体的事情。当今世界上不少国家,如澳大利亚、丹麦、冰岛、德国和英国等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女性,而且她们都非常善于政治管理。这表明,在未来的性别政治博弈之中,两性更应寻求和解,寻找共同点,达成共识,共同为人类的未来寻觅新的道路。这也就意味着性别政治的终结!

参考文献:

- [1] [美] 杨联陞. 国史探微 [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 [2] [五代] 刘昫. 旧唐书 [M]. 上海: 中华书局, 1975.
- [3] [西汉] 司马迁. 史记 [M]. 上海: 中华书局, 1975.
- [4] [东汉] 蔡邕. 独断, 四部丛刊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10.
- [5] [清] 孙承泽. 春明梦余录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2.
- [6] [法] 朱莉亚·克里斯多娃. 妇女的时间 [A]. 程巍译. 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7] [美] 查伦·斯普瑞特奈克. 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 [J]. 秦喜清译. 国外社会科学, 1997.

(责任编辑 刘 强)